

# 傅山书学的原创精神

## ——纪念傅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

□ 沈 鹏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坼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艺术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有成就的书法家几乎都以强烈的个性和大胆的创造见长，傅山（1607~1684 年）是其中的代表。

傅山是我国历史上一流的杰出人物。今天人们通常把傅山只看作一位艺术家，而事实上，他首先是思想家、学者。一般说来，哲学、史学、文学等门类的修养对书画艺术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傅山这样个性突出的书法家来说，意义更为重要。傅山在古代哲学和史学方面的研究称得上既有专攻又有独到的贡献。作为书法家，傅山卓然超群的风格，既是个人审美思想的表露，同时更是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期社会文化特点在书法上的反映。因此，梳理傅山审美思想的来源与构成，探究时代环境对其性格与行为的影响，对理解傅山及其艺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傅山的学术源自家学，他的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见长，曾做过临泉王府教授；其祖父傅霖是进士出身，对《汉书》颇有研究，并且刊印过《淮南子》一书；其父亲傅之谟以教书为业，虽然家道中落，但仍保持着书香门第的传统。如此的家庭背景，确立了傅山偏重先秦诸子和史学的学术取向。

傅山在学术上下工夫比较多的主要是《老子》、《庄子》、《墨子》及《左传》、《史记》、《汉书》等著作，在他的《霜红龕集》中即收录了大量有关上述著作的读书札记和杂记。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傅山读书及其学术研究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注重学究式的章句训诂式钩沉考证，尽管他早年也花费精力编撰过《春秋人名韵》、《汉书人名韵》和《后汉书人名韵》这样的索引书，尽管在其现存的抄录《庄子》和《墨子》的手稿中也有关于文字讹误异同的订正，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古人精神主旨的领悟，对古

人言语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的挖掘，对自己内心体会的表达及发挥。也许是因为傅山没有留下系统的有规模的专门著述，也许是因为他的学术文字中带有更多的个人感慨议论，所以许多人在谈到明末清初的学术时往往将他遗忘。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才真正反映出傅山的艺术气质，反映出傅山独有的个性，因而凸现出其在明末清初的特殊价值。

说到明末清初的学术，晚明人承袭宋人的理学传统，好谈心性，其末流则堕于空疏乃至狂禅；清初朴学兴起以实事求是的学风取代晚明的空疏不实。但矫枉过正，则显露出繁琐刻板和逃避现实的弊病。傅山生当其时，而且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却能保持着独立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品格，不能不说是十分特殊的。傅山早年曾写过一本谈心性的著作《性史》，此书虽已失传，但据傅山自己追记，其中充满了“反常之论”<sup>[1]</sup>。其晚年与朴学中坚顾炎武、阎若璩等关系密切，却也并没走上考据训诂的道路。傅山的学术更侧重于内心的省悟和对现实的批判。他读诸子、读史，处处与自己生活的现实相结合，从对古人的解读中提炼出自己的主张，而他所关心的问题，更多的属于人性层面或是社会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山的学术带有明显的哲学和伦理学色彩，与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提倡独立精神，反对奴性。黄宗羲主张“务得于己，不求于人”，“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sup>[2]</sup>。王夫之指斥“流俗者，禽兽也”，并宣称“生可损，国可亡，而志不可夺”<sup>[3]</sup>。而傅山则强调“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sup>[4]</sup>顾炎武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反对空疏清谈。傅山则在读书或撰文的过程中往往对古代忠贞节烈之士大力褒扬，甚至为抗清的

明朝官员和义军将领作传,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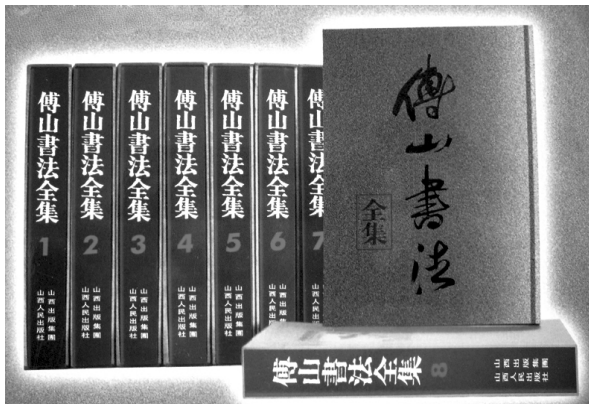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上,傅山主要集中在对《老子》、《庄子》及《墨子》的研究。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通过对自然规律、人类思想、生活事物等内容的思辨分析,表达出各自的治国治民的主张和理想。傅山从这些著作的研读、思考中获得启发,并受益匪浅。一方面,他以强烈的反清政治思想为基点,吸取老庄思想中不畏权势、不共流俗的一面(傅山的反对宋代程、朱理学,也是出于政治上对统治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对先秦诸子的研读也促成了他超凡脱俗、桀骜不驯的审美追求。他借助书法、诗文等形式将这一追求表达出来,并在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成为傅山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傅山书法所体现的强烈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人秉性及所处时代有密切关系。傅山生性耿介,在他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他在年轻时为了给遭受诬陷的山西提学袁继咸鸣冤,毅然带领一群同学进京请愿,几经周折,最终获得成功。傅山因此名声大噪,并赢得“义士”的赞誉。明朝亡国当年的除夕,他写下了《甲申守岁》诗两首,其中有“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掩泪山城看岁除,春正谁辨有王无”,及“梦入南天建烽都”等诗句。第二年生日时,他又作诗:“生时自是天朝闰,此闰伤心异国逢。一日偷生如逆旅,孤魂不召也朝宗。”诗中充满了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而这样直白的表达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傅山因在感情上抱着敌视清朝的态度,而且与反清人士保持着密切来往,因此在顺治十年被牵连入狱。后来虽经友人营救出狱,他仍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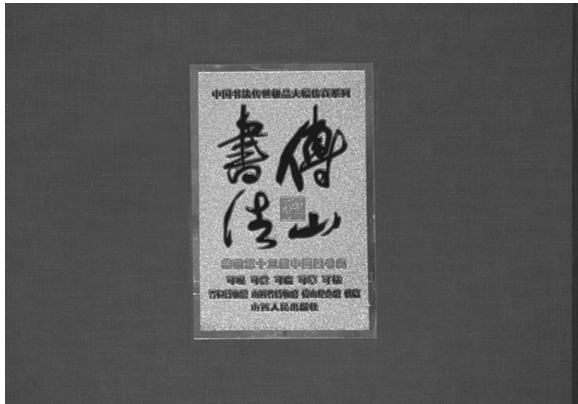
取与清王朝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当他在康熙十七年被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时,他先是推辞不就,被强迫挟持到北京后,他又借口生病坚不入城,拒不参加考试。这一系列表现,不仅清楚地表达了傅山的政治态度,而且也对其审美思想的逐渐明确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果说,在学术上对先秦诸子的研读、领悟使傅山形成了注重自然、追求精神自由和崇尚复古的世界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态度及表现,则是其个性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者相互融合,构成了傅山书法艺术实践的特征以及风格追求的深层动力来源与基础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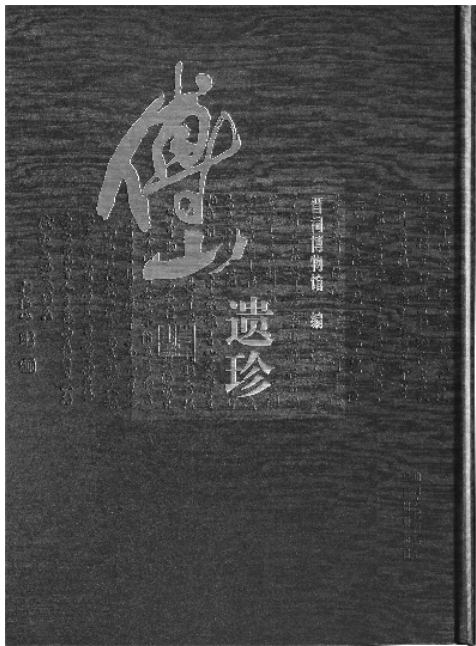
说到傅山在书法上的理想追求,影响最广的要数他所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四宁四毋”主张。应该说,傅山并不是片面地强调拙、丑、支离、真率,而是重在告诫人们避免巧、媚、轻滑、安排,在矫枉不妨过正的前提下,肯定了拙、丑、支离、真率的审美价值。美与丑、巧与拙,原本就是美学和艺术史上的常见命题。从先秦诸子中老子“大巧若拙”、“见素抱朴”、“信而不美”等主张,庄子“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的法天贵真思想,墨子“不修文采”、“不为观乐”的返璞归真思想,到《淮南子》、《抱朴子》等典籍中有关美与丑、文与质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四宁四毋”主张的学术根源。在书法上,苏轼有“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吾闻古书法,守骏草如跛”的诗句;黄庭坚则有:“凡书要拙多于巧。”至于“四宁四毋”的表述方式,也有学者提出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曾说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的话<sup>④</sup>。尽管如此,傅山“四宁四毋”主张的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傅山书法全集》全套八册



由赵宝琴、李勇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书法传世极品大幅仿真系列——傅山书法》5辑,2002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大奖



由晋祠博物馆编辑出版《傅山遗珍》

提出,在书法史上仍是一个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开拓。

首先,傅山在领会和把握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和发挥,将拙、丑、支离、真率作为书法艺术的审美原则提出来,尤其是把“丑”的审美价值引入书法,从美学意义上丰富了“丑”的含义,明确肯定了“丑”在艺术创作中是真美、大美的本质意义。这一富有创新精神的主张,拓展了书法艺术中的品评标准和风格类型,对后来书法的发展,特别是碑派书风与碑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四宁四毋”的提出在当时还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生当明清鼎革的特殊时代,傅山性格中的侠义之气和民族自尊使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必然会反映在他借以寄托理想、抒发情绪的书法方面。傅山在提出“四宁四毋”主张的《训子贴》里,一开始就坦陈早年受赵孟頫书法的影响,并肯定赵为“用心于王右军者”。但是傅山的反清立场使他“大薄其为人”。在傅山心目中,颜真卿是其尊重和效仿的榜样,这样情感远远超出了他对颜书本身的尊崇,更由于他敬佩颜真卿的刚正忠义,蔑视赵孟頫的软弱失节。因此由他来提出“四宁四毋”这样振聋发聩的主张,就显得再合理不过了,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在书法实践上,傅山将对旧的法度的扬弃与对新的审美范式的创造同时实现。随着其艺术思想在

学术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成熟,对自然古朴意象的理解,对精神自由境界的追求,便成为其书法风格最重要的特征了。他偏爱笔势飞舞、墨色淋漓的狂草,喜欢写高轴巨幛,甚至写篆书也采用率意潇散的草篆笔法。这些都表现出其不同寻常的个性习惯。对于传统的技法原则和品评标准,傅山既尊重、传承,又有意识地回避、摆脱甚至打破现成的规范,这是傅山与其他一般书家最显著的不同。如果将傅山与同时代的王铎比较,王铎的创造性、个性较多地在贴学范围内施展;而傅山则体现为对同一对象从不同角度认识和发挥的能力。

今天我们历史地看问题,赵孟頫书法承传“二王”发扬“秀美”一路,独具美学价值。“台阁体”、“馆阁体”“偏取其媚”,不能都由赵孟頫负责。历史上许多宗师的学说、艺术,后人都可取其一端而形成不同流派。傅山的“四宁四毋”,最可贵的是反潮流、反媚俗的精神。傅山在提出“四宁四毋”之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是真谛之所在。

我们历史地看傅山的哲学、美学思想,就不会把“四宁四毋”简单化、形式化。如果看不到、看不惯一些富有原创精神的、积极探索的作品,就简单地将其贬为与“美”相对立的“丑”,至少是对“美”的认识偏仄、狭义了。另一方面,如果对“丑”、“拙”、“支离”、“真率”仅从技法层面理解,甚至刻意追求外表形式,那么失去的是美的本质,可能恰恰流入“巧”、“媚”、“轻滑”、“安排”;而书法的真正的“言志”、“流美”便丧失了。《庄子》一连叙述了五个外形丑陋的残疾者<sup>[9]</sup>,但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生命自身的精神力量超越了外在的“丑”,而外在的“丑”适足凸现不是“掩盖”出内在的本质的美。傅山的美丑观念,也可以从《庄子》中找到依据而进行深入理解。

选择“四宁四毋”这样一条道路当然需要高度的自信和超群的胆魄,而傅山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傅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理想目标与当时的普遍口味格格不入,但他仍充满自信,我行我素。他曾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题写:“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始定。”“吾看画看文章诗赋与古今书法,自谓别具神眼,万亿品类略不可逃。每欲告人此旨,而人惘然。此识真正敢谓千古独步。”<sup>[10]</sup>可以看出,傅山坚信自己的眼光,坚信自己的目标,不屑于追随当下的流行,不屑于跟在前人后面亦步

亦趋。这是真正的个性。只有具备这样的个性才有创造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山原创精神的价值超越了他的书法成就所达到的高度。

傅山在书法上的个性和创新,还体现在他对碑学的重视和汲取。碑派书风及碑学思潮是清代书坛上最重要的现象。尽管在傅山的时代,碑学理论尚未形成,但是已经出现萌芽,傅山便是代表人物。同时,傅山所交往的学者中多有酷嗜金石文字者,受风气陶染,傅山自然会关注到碑刻的书法价值,而古代碑刻所具有的古拙厚实的效果与傅山的审美取向正相契合。

傅山对碑刻价值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他对篆、隶、楷各体关系的强调上。对待读书,傅山认为“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能”<sup>[11]</sup>,同样,这种主张他也运用到书法中。傅山宣称“楷书不自篆、隶、八分中来,即奴态,不中观矣”<sup>[12]</sup>。“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sup>[13]</sup>在当时人们对碑刻的认识还有限的情况下,傅山就已能够通过碑刻将各种书体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具有超前性的精辟见解。事实上,傅山的上述观点以及他对汉隶的论述都为后来的碑学理论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傅山在书法上融会贯通的本领及修养。

傅山虽然各体皆能,但其骄人之处不在于技法意义上的“多面手”,而在于融会诸体。也许单从技巧层面看,他的篆、隶书法成就比不上后来的许多名家。然而其篆、隶意趣在行草书中融会运用的开创风气之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少有的变革之举。如果傅山不是一位草书大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将大为逊色。又如果傅山的草书不能融会篆、隶,他的草书成就也将大为逊色。在这一点上,傅山与稍后继起的八大山人有共同处,而八大山人的风格则趋向内。

《庄子》有“和之以天倪”之说。傅山把“天倪”的思想运用于书法:“写字一道,即俱是倪,积月累岁,自知之。”又说,写字之前不得勉强“先萌一意”,“……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sup>[14]</sup>郭象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遵从自然,既是哲学的理念,也是书法的理念。“拙”“丑”“支离”“真率”,这些看起来与通常相悖的美学观念,其实无非是在最大范围内、最高意义上的回归自然。

今年,为纪念傅山诞辰四百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依托独具的地区优势,以弘扬先进文化的使命

感,积五年之功,集全国博物馆及部分私人收藏,延请专家,出版《傅山书法全集》,合书艺与学术为一体,由傅山书法辐射其全人、其时代。

读《傅山书法全集》,我们再次体会到,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程式化和规定性很强的艺术,在它的每个历程中,既需遵循既定的规范,又需不断开拓、创新。书法同各门艺术一样,要在开放的观念下吸取传统精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转化和发挥,从而不断丰富、拓展书法的内涵及意义,实现书法在现时代的发展。我们提倡原创精神,弘扬个性,就必然要肯定时代艺术多元化的趋向。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解读像傅山这样的杰出人物的意义所在。

[1]《傅山全书》卷三十九《杂记六》,第一册第 778 页。

[2]黄宗羲《南雷文定·恽仲升文集序》。

[3]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下卷。

[4]《傅山全书》卷四十三《杂记十》,第一册第 878 页。

[5]《傅山全书》卷十二《右玄貽生日用韵》,第一册第 227 页。

[6]苏轼《和子由论书》。

[7]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李致尧乞书卷后》。

[8]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第 190 页。

[9]《庄子·德充符》: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支离无。

[10]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第 179 页。

[11]《傅山全书》卷四十二《杂记九》,第一册第 875 页。

[12]《傅山全书》卷二十九《家训》,第一册第 519 页。

[13]《傅山全书》卷四十二《杂记九》,第一册第 855 页。

[14]《傅山全书》卷四十二《杂记九》,第一册第 851 页。

[15]《傅山全书》卷二十九《家训》,第一册第 511 页。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